

## 《共产党宣言》与毛泽东的“相结合” ——以文本传播为视角

王海光

**摘要：**本文以《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文本传播为研究视角，试图厘清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变通、变形和变异过程，也就是马列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本土文化和智慧“相结合”的过程、共产主义世界革命与中国社会激进革命“相结合”的过程，从而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发展，理解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逻辑。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毛泽东；文本传播；新民主主义

**作者：**王海光，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当代史和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主要著作有：《旋转的历史》（1995年出版）；《从革命到改革》（2000年出版）；《林彪事件》（2012年出版）。邮箱：wanghaiguang@sina.com

**Title:**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Mao Zedong's "Combination"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 Communication

**Abstract:** Base on the text commun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process involved in the spreading and adapting, of the various transformation of Marxism Leninism in China. A process also known as "combining" Marxism Leninism theory with Mao Zedong's local culture and wisdom, and of "combining" the Communist world revolution with Chinese social radical revolution. This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Marxist China, and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hina, progressing from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o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Keywords:** Communist Manifesto; Mao Zedong; text communication; new democracy

**Author:** Wang Haiguang, is a retired history Professor at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He currently holds a Visiting Professorship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Wang'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His main publications include: *The Rotation of the History* (published in 1995),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published in 2000) and *The Lin Biao Event* (published in 2012). Email: wanghaiguang@sina.com

20 世纪初年，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新旧交替时期，社会道德失序，政局动荡不安，人心扶摇不定。各派政治势力激烈角逐，各种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新旧文化激荡冲击，给积贫积弱的中国带来了激发活力的强烈刺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旗帜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并迅速进入到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掀起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暴风骤雨，把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推到了最高潮。共产主义输入中国的过程，也就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即马克思的西方阶级斗争理论、列宁夺取政权的机变能力和中国社会激进的革命运动“相结合”的过程。马列主义革命向中国的输入和移植，有着不同国情的巨大落差，有着水土不服的变通性和南橘北枳的变异性问题，所以，“相结合”的“试错”过程曲折激烈，付出了极高的历史代价，最后才实现了列宁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

研究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变通、变异和变形，离不开对马列主义经典文本的传播史研究。但是马列主义书籍浩如烟海，取其删繁就简之道，可以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本进行传播史研究。在中共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可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和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这几篇马列著作是中共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书，在全党反复学习，构建了中共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共产党宣言》讲的是阶级斗争问题，《国家与革命》讲的是阶级专政问题，《帝国主义

论》讲的是时代问题，《联共（布）党史》是斯大林主义的“百科全书”。

《共产党宣言》是在中国传播的马列主义经典文本中最为根本的一部。它既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革命道统，又是中共进行阶级斗争的一部革命圣经，在实现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上具有多重时代性意义。从阶级斗争学说传播史的研究角度，《共产党宣言》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经典文本。

在中国能够领袖群伦实现这个“相结合”的，既不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也不是莫斯科一手培养起来的职业革命家，深得斯大林信任的王明等人，而是志向远大、博览杂书、意志坚定、性格强悍的一个湖南湘潭的农家子弟毛泽东。毛泽东的成功，客观上是历史机缘辐辏的结果，主观上是他与众不同的个人禀赋、知识结构和实践能力，使之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民众有更深刻的了解，因而也更具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的能力。

毛泽东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坚定信奉者，一生都在搞阶级斗争，临终前还讲“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但在学理层面上，马克思所讲的阶级斗争，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毛泽东所讲的阶级斗争，则是前现代化传统国家在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的阶层分化。两者具有着不同历史时代语境的巨大社会文明差异。所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在学理逻辑上多有不合之处，为国际派教条主义者讥讽为“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应该说，国际派教条主义认为毛泽东的马列主义水平低下，视为“旁门左道”的讥讽，都是所言不虛的事情。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马列主义原本不同，或者说是一种变了形的马列主义。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变形，是为适应中国土壤的中国化改造。事实上，如果没有“相结合”的中国化变异和变形，这个舶来品的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社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需要有对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的知识经验，需要有了解底层社会情况的江湖阅历，更得有坚忍不拔的知行能力，否则是不能完成这一过程的。

本文以《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文本传播为研究视角，试图厘

清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变通、变形和变异过程，也就是马列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本土文化和智慧“相结合”的过程、共产主义世界革命与中国社会激进革命“相结合”的过程，从而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发展，理解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逻辑。

## 一、《共产党宣言》传播与中国共产革命的积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宗立派，是以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为时代标志的。它认为：现代化大生产使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原有的社会关系已容纳不了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的要求，断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而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全球化的运动，“工人阶级无祖国”。

《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sup>1</sup>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党宣言》是一篇激情四溢的论辩文体的小册子，其真理在握的自信，文采激扬的文字，铿锵有力的逻辑，简单明确的结论，对青年人是极有魅惑力的，比较《资本论》，对中国人有更重大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都宣称自己是读了《共产党宣言》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少有人讲：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是读了《资本论》，洞悉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从而投身共产革命的。《资本论》这部号称“工人阶级圣经”煌煌大作，深奥难懂，艰深晦涩，不是一般人能涉足的。然而，比《资本论》更难让中国人读懂的，还是马克思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这位一生都在过流亡生活的犹太血统的德国人，在世界工业文明中心的英国伦敦创作了《资本论》，提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理论”学说。这个著书立说的历史场景，与前现代化的

---

1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307页。

传统农业国家的中国国情，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社会时代。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与前工业化的传统中国社会完全是不着边际的事情。还没有走出传统国家体制和传统农业社会的近代中国，轮番上演的就是白骨露於野的饥荒和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战乱。西方工业社会发生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奢侈的海外奇谈了。所以，要让他们穿越两种时空环境来读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实在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不可思议之事了。在中共早期建党人物中，对《资本论》有过学理性系统研究的，可能是在日本留过学的李达了。这位中共创始人，毕生搞的是课堂上和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从事都是“书斋里的革命”，并没有搞过实际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军事活动。<sup>2</sup>如果不是他参与组党的中共革命成功，以其才具而言，可能终身就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教书匠而已。

毛泽东多次提到《共产党宣言》对他思想的重要影响。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县的山沟里，给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介绍自己的革命经历时讲：他是在1920年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由此而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sup>3</sup>1941年9月，毛泽东又在延安回顾说：他是读了这三本小册子，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sup>4</sup>他从中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成为了他一生的信仰和事业。

毛泽东给斯诺讲他阅读《共产党宣言》的时间，可能是有意识地给提前了。据研究者考证，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此时还尚未出版。<sup>5</sup>（罗章龙回忆，毛泽东读的是北大的油印本<sup>6</sup>）。但这

2 参见宋镜明：《李达传论》，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3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31页。

4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22页。

5 【日】竹内实著：韩风琴、张会才译：《毛泽东传记三种》，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214-215页。

6 罗章龙在1990年3月曾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

正是表明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的高度重视，奉之为阶级斗争的经典教科书。在他的有生之年，多次督令全党干部阅读该书，“弄通马克思主义”。<sup>7</sup>然而，毛泽东缺乏西方民主社会和大工业时代的知识背景，对《共产党宣言》所言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着理解上的时代偏差。他最看重的是《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两个决裂”的思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毛泽东早年曾信奉“新民说”，革命志向就是要全面改造社会和全面改造人们思想观念，这与“两个决裂”在情怀上是一致的。然而，他毕生也没能理解《宣言》追求的人类社会价值理想目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8</sup>但是，正因为这种知识局限性和时代错位，却给毛泽东提供了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想象空间，给他解读和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带来巨大的灵活性。这正是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一个关键问题。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如饥似渴地对西方学术的知识追求，对新潮的马克思学说也有了一点粗浅的知识。但无论是知识界最新潮的学问家梁启超，还是政治上最激进的革命家孙中山、朱执信等人，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学说的一种，并没有予以特殊的厚爱，更没有把它作为救世良方。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中国社会仍然是前现代化阶段的传统农业经济体系，现代工业体系还只是萌生阶段，所谓产业工人不过是一群刚刚来到工厂

---

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

《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按照德文版翻译的，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是油印稿。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毛主席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

7 1964年2月，毛泽东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30本书中，第1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同时期，毛泽东阅读的马列经典著作还有，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学马列。所列的6本马列著作中，第1本书也是《共产党宣言》。

8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293、294页。旧译文为“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见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91页。

打工谋生的农民，没有形成阶级意识，只有帮会气质。马克思所讲的西方工业社会两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中国社会还是一件遥不可及的神话预言。

然而，在中国从晚清以降的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政治和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非常剧烈，这个混乱的国情为最激进的革命理论提供了土壤。这是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得以传播到中国的基础条件。

列宁主义是带有东方专制主义和俄罗斯民粹主义双重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其要义，一是组织职业革命家集团的集权制政党，进行秘密活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一党专政；二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积极推动世界革命，实现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共产党宣言》打出的“消灭私有制”的旗帜，要改变人类社会千百年形成的产权结构和财产观念，这只有是依靠超级国家的暴力专政手段才能实施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的精疲力竭的俄国，列宁和他的职业革命家团队伺机起事，利用社会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一举夺取了国家政权，开创了在一个国家实现阶级专政的成功范例，即十月革命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以密谋式革命取得政权，以政党统治国家，自上而下地全面改造社会的暴力革命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是一系列军事共产主义的制度安排：一党专政、领袖政治；阶级镇压、红色恐怖；统制经济、掠夺农民；舆论控制、思想统一等等。在这里，既有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又有为实现这一价值理想而实施的冷酷无情的暴力手段。这些东西后来为斯大林所继承，形成了苏式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体制。<sup>9</sup>有关苏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可以概括出许多方面。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体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结果，而是基于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意识形态理由建构起来的，拥有超然于社会之上权力的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共产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统治国家，全面控制了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思想资源，对全社会实施最完全最彻底的改造。列宁主义的共产革命是人类社会一场声

9 关于苏联史的研究，国内外著述甚多。大陆学者的研究，史论方面可参见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主编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史实方面可参见闻一著《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势浩大的社会实验，具有颠覆过去一切文化价值和制度体制的激进特征，给 20 世纪带来了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

列宁主义的政党国家体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列宁主义政党是一个革命家集团的领袖党，领袖、政党、阶级的关系是倒置的。政党是代表阶级意志的先锋队，领袖是政党的头脑。阶级本体的阶级意识需要政党的灌输，否则不能由“自在阶级”成为“自为阶级”；政党需要领袖集团的集中制领导，否则就没有组织纪律的战斗力。这是一个头脑决定论的政党理论。政党的领袖集团可以用先锋队的名义，矫命阶级的名义夺取国家权力，矫命阶级的名义统治国家，矫命阶级的名义改造社会。通过组织一个领袖党，可以把无产阶级革命移植到任何地方，开展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推进共产革命。20 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无疑是列宁主义政党体制的胜利。它向全世界推广了一个极权主义政党体制，制造出来了一套人类历史发展必然道路的意识形态误区，形成了一场以阶级革命为旗帜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风暴。

列宁在 1916 年写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sup>10</sup>，提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和最后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前夜，帝国主义是战争策源地等等论断。列宁在 1917 年写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提出了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用国家政权的暴力改造社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革命道路。<sup>11</sup>这两个小册子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新发展，推进世界革命的理论依据，俄国十月革命的代表作。列宁和他的革命密谋集团，利用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得疲敝不堪的机会，发动武装暴动，推翻了软弱的克伦斯基政府，建立了俄共独掌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为了推进世界革命，于 1919 年成立了共产党国际。1920 年 7 月，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一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以

10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 年 1-6 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575-688 页。

11 列宁：《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1917 年 8-9 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09-221 页。

预言家的口吻强调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sup>12</sup>然而，当列宁领导的苏俄红军，试图将共产主义世界革命从俄国推进到欧洲时，欧洲各国工人阶级非但没有响应他们的“解放者”，而是奋起抵抗。1920年8月，苏俄在与波兰的战争中，苏俄红军惨败于华沙城下，从而断绝了从欧洲推进世界革命的企图。这不仅摧毁了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预言，同时也验证了马克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不着边际，整个欧洲大陆无情地拒绝布尔什维克主义向西方的蔓延。这是导致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将世界革命的重点由欧洲转向东方的一个重大原因。1924年，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做出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概括。<sup>13</sup>中国的共产革命，就是在这个历史语境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最初对十月革命阶级专政的革命暴力在心理上是有排斥的。陈独秀、李大钊，乃至毛泽东都曾有过对革命暴力负面评价的言论。在苏俄革命输出的影响下，他们从世界革命的学理层面上接受了列宁主义，但未能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上海党组织起草的早期建党文献，如《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sup>14</sup>，《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sup>15</sup>，所称的推翻资本家阶级、阶级争斗、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政治话语，其实都是来自外国共产党的抄本，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是脱节的。

1958年6月，毛泽东重读了1920年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给予了“空想”的评价。认为这个建党文件“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

---

12 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82页。

13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1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47-550页。

1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sup>16</sup>也就是说：这个建党文件对中国革命性质上的认识是错误的，对国情认知和基本政策是错误的，采取的革命形式也是错误的，完全不清楚中国的共产革命是农民战争的形式。这当然是事后之明的评论。问题是：这样一场“舶来”的革命运动，却获得了意外的巨大成功。这绝不是“主义”二字所能解释的，实乃是中国革命的愿力所致。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苏俄向中国输出革命的产物。在世界革命中实现中国的复兴，是陈独秀等人接受共产主义的重要因素，并成为了毛泽东这一代共产党人毕生追求的目标。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暴力革命观、阶级斗争观和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观，这是中共与生俱来的政治胎记，中国革命由此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在中国共产革命的过程中，陈独秀最后成为了“终身反对派”，摒弃了十月革命道路和斯大林体制，重新肯定了欧美主体制的价值。<sup>17</sup>莫斯科派领导人照搬苏联十月革命道路的中国苏维埃革命，在城市和农村都失败了。毛泽东则搞出了一个与苏联道路不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农村为革命基地逐渐发展力量，取得了夺权革命的胜利。这是在马列主义阶级斗争观念指导下的新式农民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进而把阶级斗争运用于治国理政方面，接连不断地进行各种政治运动，以推动共产主义的早日实现。文革中被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三个里程碑”的毛主义，也就是阶级专政论在固权革命上的继续发展，以至于造成了文革的巨大灾难。以往的成功经验却成为以后失败的伏笔，历史的复杂性也就在这里。

## 二、《共产党宣言》与中共领导人的马列主义学养

中国的共产革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这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无产阶级革命，有着跨时代的时空落差。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穿越这两个时空环境的理论创见。毛泽东没有读马列主义原著的学养能力，对马列主义著作的阅读非常有限，对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80-381页。

17 陈独秀遗著：《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自由中国社出版部，民国二十八年。

原理的掌握远不及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留学生，但在本土化的融会贯通能力上却是全党无人可及的。在这个中国革命实践意义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土洋结合，学用贯通，是一种“不经不典”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把西方的马列主义学说与本土的中国农民造反传统相结合，打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与传统农民战争“杀富济贫”底层正义的联系，概括为“阶级斗争”四个字。他在延安庆祝斯大林60岁生日的讲话中，要言不烦地归纳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sup>18</sup>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夺权道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在阶段论上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翻版。在革命动员方面，毛泽东改变了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轻视农民革命性的看法，把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与中国农民造反运动的结合，贯通了《共产党宣言》阶级革命的正义性与《水浒传》替天行道的正义性。

从文本学意义上讲，在中国共产革命的意识形态建构上，那些大部头的马列原著可能起不来多少作用，倒是那些小册子更具根本性。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有读小册子的经验体会，都有删繁就简的“相结合”能力。所谓“相结合”，说到底，就是为我所用的变通性。这也就是传统学术讲的“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关系。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走的就是“六经注我”的路线，并不拘泥马列经典的言语，策略灵活机变，最后是以革命的成功作为“相结合”的成果。而更熟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亦步亦趋执行国际路线的王明等人，则为“六经”所困，掉到了书袋里面，与中国国情“结合”不起来。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给井冈山的老战友曾志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他举自己的读书经验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

18 《毛主席十年前所作的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的论文和演说》，《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0日。该文与原文有些许出入。

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sup>19</sup>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搞清楚党的路线问题。1943年12月1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用半年时间学习六本书。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毛泽东编辑的《两条路线》上下册。强调学习要展开争论，提出中心问题，开展自我批评，联系实际。这实际上是以马、列、斯的五本书，对照毛泽东编辑的《两条路线》的中共历史文献，批判国际路线领导人。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毛泽东又向全党提出学习上述马、列、斯五本书的号召。他说：“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sup>20</sup>他希望能有五千到一万人去读过，有个大致的了解。

毛泽东在七大的大会结论中，还专门谈了党性与个性的问题，解释了个性、自由、人格的发展，引据了《共产党宣言》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话。毛泽东说：“不能设想把一百二十万党员变成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一模一样，那会有什么党性！只要服从党，在此范围内尽量发展各人的长处，不要只喜欢那些纸糊泥做的人。”<sup>21</sup>他还严厉批评了党内一些人的“装”、“偷”、“吹”的学风。“要讲真话，不偷、

---

19 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转引自《缅怀毛泽东》（上），第二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5页。曾志回忆毛泽东与她讲话的时间是1939年底，似记忆有误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初是1940年1月在《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曾志在延安与毛泽东来往很多。毛讲他在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时，反复阅看《共产党宣言》，应是后来的谈话。

2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0-351页。

2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6页。

不装、不吹。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sup>22</sup>

毛泽东这一代中共领导人，是从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打拼出来的，都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善于因地制宜地总结经验，审时度势地决定政策，有自己的一套学以致用学习方法。

刘少奇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比较系统地接受过马列主义理论训练，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比较高，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读的也比较多。刘少奇在1964年给朱理治的信中，介绍了他读马列著作的经验：“越大本头书，越记不住。读书不在多，只要关键的东西读了，如《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史》，起作用的是这些小册子，到了有问题的时候翻一翻。”<sup>23</sup>

林彪也是党内很会读书的人，很善于思考问题，对马列主义哲学著作尤其有心得。林彪读书有剥丝抽茧的本领，经验是少而精，删繁就简，提取精华。林彪读书喜欢做卡片，摘取核心的句子。他提出的学马列的“走捷径”，学毛著十六字方针，“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也是他自己读书的经验之谈。他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也是以《共产党宣言》为基本。林彪读《共产党宣言》，用裁剪法读书，一本书剪到最后，只有“大工业、大机器”这几个字了。<sup>24</sup>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针对党内反改革势力掉书袋，以“姓资姓社”诘难改革开放，讲了他们这一代如何读马列书的箴言：“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邓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

---

22 同上。

23 刘少奇：《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24 李根清：《毛家湾林彪琐事》，《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西，很朴实的道理。”<sup>25</sup>

这些中共高层领导人讲的读书经验，都是很朴素很实在的道理，也是他们领导革命的真知灼见。中共的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化繁为简，一言蔽之，就是小册子革命、小册子治国。在革命的“学以致用”的小册子中，《共产党宣言》提供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具有树立“道统”的价值意义。历史与理论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从面临的具体问题读书，读书要精炼、要管用、要能够解释现实问题，这是毛泽东一代领导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态度。这种学以致用、实事求是学风，使他们具有政治上极其灵活的变通能力。在意识形态的原则性后面，又有政策变化的灵活性。

### 三、《共产党宣言》与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建构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共筹谋建立新中国的重大会议。全会以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作为新中国建立的政治理论，向全党提出了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政党和国家学说、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建设任务，开列出了12本干部必读的马列主义书籍。<sup>26</sup>毛泽东在会议上说：如果在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12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12本书，那就很好。<sup>27</sup>

在中共建政之后，《共产党宣言》是建构新中国意识形态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石，表达了“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但是，对《共产党宣言》中轻视农民的认识，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是它的不足之处，苏共也没有搞好，而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发展。<sup>28</sup>

在急速完成了城乡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是对

2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26 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

27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作总结讲话（1949年3月13日）。

28 《刘少奇关于高级党校工作问题对杨献珍、侯维煜的两次谈话纪要》，1956年7月。

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杭州会议上提出：现在如何去看《共产党宣言》，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sup>29</sup>毛泽东在此说的这个相结合的问题，是从社会动员的角度讲的。如上述1958年毛泽东评论1920年《中国共产党宣言》空想时讲：“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sup>30</sup>

在国家施政方面，《共产党宣言》所言的无产阶级执政后采取的十项政策措施，成为了中共在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的方向性目标。在反右派运动后，其观念革命的部分又得到强调。

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共产党宣言》所讲的未来社会政策，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政策设想层面，推到了“抢先进入共产主义”的现实政策层面。在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总路线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sup>31</sup>

大跃进中，国家有关部门从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摘编了《论共产主义公社》<sup>32</sup>小册子，下发各地，作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方向目标。这些小册子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未来无产阶级国家的政策设想：工业和农业结合、消灭城乡对立、教育与物资生产结合、义务劳动制、农业产业军、总计划开垦荒地等，作为为了政策制定实施的理论依据。在大跃进运动中，“两条腿走路”、破除“法权”、“工、农、商、学、兵”一体的人民公社体制、公共食堂、全民炼钢、大办教育文化、大办各行各业、大规模移民边远省份等激进的发展政策。

《红旗》杂志1959年第2期发表了署名文章《社会主义农业产业军》，喜气洋洋地宣称：《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提出的农业产业军的纲领，“在我国正在逐步成为现实。”<sup>33</sup>

29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1月4日。

30 毛泽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551页。

31 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三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演》，1958年7月1日。

32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编：《论共产主义公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

33 童大林：《社会主义的农业产业军》。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组编：

在 1960 年代的“反修防修”运动中，《共产党宣言》的传播学意义又有了新的变化，成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理论武器。在中苏论战中，《共产党宣言》是中共维护马列主义纯洁性的道统符号，运用于“九评”之中。

中共的“反修斗争”是与苏共争夺正统性的斗争，但中共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学养实在很低，许多军队高干连《共产党宣言》也没有好好读过。如某军队高干讲：“书，我们老早就有了，先是挑夫挑着，后来马驮着，以后又用汽车载着；但就是没读它。”<sup>34</sup> 1964 年 2 月，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指示中宣部开列了学习马恩列斯和普列汉诺夫的 30 本书的书单，第一篇就是《共产党宣言》。<sup>35</sup>

从实际效果看，马列导师的这些书对于各级干部们还是太深了，他们能看得懂的还是毛泽东的东西。为此，中央编发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提供给普遍干部和群众学习。真正大行其道的是还是林彪在军队推出的《毛主席语录》、“老三篇”这些“急用先学”的实用主义东西。毛泽东个人崇拜在 1960 年代的狂热，与中共干部普遍低下的文化程度是大有关系的。

在“四清”运动的大抓阶级斗争中，夺权革命的暴力革命基因被再度激活。1947 年激进土改的一些做法，在“四清”的大整基层干部中又重复出现了。

1964 年 12 月 20 日，毛泽东在讨论“四清”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讲话，又举《共产党宣言》为例，讲阶级斗争策略问题。他说：“列宁很重视农民，提工农联盟。《共产党宣言》就怕小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的缺点、消极面提得过多。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看你强调哪一面。中国有多少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更多。对流氓无产者更不客气。就强调消极面？他有积极的一面嘛！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改造的。”<sup>36</sup> 虽然毛泽东的讲话语境，具体

---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文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59 年。

34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文件附件，1964 年 2 月 15 日。

3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 册，第 25-28 页。

36 《毛泽东思想万岁》（编者不详），第 5 册，第 197 页。原题为“在中

针对的是四清运动不要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但同时又带有了民粹主义的观念意识。

在1960年代的对外“反修”和对内“防修”的交互作用下，毛泽东“不经不典”的马列主义被自我封圣化了，成为了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林彪表述为：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林彪这个理论表述得到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肯定。<sup>37</sup>

在论证毛泽东如何“继承、发展”马列主义时，《共产党宣言》是一个重要的比对标准。陈伯达说：“主席说：《共产党宣言》很大的缺点是对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亚洲的局面。”康生从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方面论证，“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丰富了超过了马列主义”<sup>38</sup>

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王明为讨好毛泽东，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概念，“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毛泽东认为不妥，说不要想宽了，要先把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要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但此时，毛泽东却欣然接受了这些更无厘头的佞臣谀词。这反映了毛泽东领导世界革命的大格局意识。

在红卫兵造反运动中，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再度成为了“继续革命”的“葵花宝典”。青少年红卫兵把它们作为阶级斗争的革命教科书，把打、砸、抢、抄的胡作非为当作是革命行动，真诚狂热地开展了这一场“红色恐怖”的革命。群众运动革命造反的民粹主义思潮再度泛滥成灾。

在文革进入到夺权阶段之后，毛泽东“继承、发展”的内容又扩大，认为是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巩固政权的问题，所以

---

央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四清问题的谈话”，实际是毛泽东1964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37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12日。

38 陈伯达1966年5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康生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参见群众组织编印：《中央首长讲话》，1967年12月。

“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sup>39</sup>这里讲的在“巩固政权”上的新创造，就是把“走资派”也作为革命对象。在解决群众运动派性斗争阶段，毛泽东又发出“斗私批修”的号召，为马列主义的“继承、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把“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发展到解决世界观问题的“治心”阶段。

我们可以从在《人民日报》每年在11月7日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的社论中看到这个“继承、发展”的变化。文革前1964年、1965年的纪念十月革命的社论中，“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从巩固政权的角度来提起的。<sup>40</sup>到文革中的1967年纪念十月革命的社论，则成了改造人的世界观的需要了。这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称毛泽东是“当代的列宁”、“第三个里程碑”。定义了“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解决世界观问题。<sup>41</sup>这就把马克思基于生产力基础上的阶级斗争学说，发展为观念领域的阶级斗争学说。

上述可见，《共产党宣言》在文革中表示的政治意象，实际上是毛泽东“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参照和比对文本。但这种参照和对比，只能是毛泽东才能做的事情。1970年8月林彪之子林立果在空军“三代会”上做“讲用报告”，被那些溜须拍马的群小们吹捧为“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这就是“僭越”之举了，反而是帮了倒忙。搞个人崇拜的效果，从来都是降低人们的智商的。

在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军人集团试图以“天才论”为武器打击张春桥文人集团，遭到毛泽东的迎头痛击。会后，毛泽东指示全党要读书学习马列主义，列了11篇必读书目，《共产党宣言》是首篇。<sup>42</sup>“学马列著作”，是毛泽东要结

39 《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伟大的历史文件》，1967年5月18日。

40 《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1964年11月7日；《沿着伟大十月革命的道路奋勇前进》，1965年11月7日。

41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1967年11月6日。

42 《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1970年11月6日）规定书目：马列著作六篇：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3、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选读）》，4、恩格

束军管体制，恢复“文治”的重要措施。毛泽东的著作，悄然放在马列之后。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也更强调的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方面。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文革意识形态陷入极大混乱。毛泽东为了说明文革是符合马列主义道统原则的一场革命，又让张春桥、姚文元选出了马列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 33 条，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学理论”运动，在社会上再度掀起“反法权”的活动。在重新修复文革意识形态中，《共产党宣言》是最基本的文本。

文革中的学习和宣传《共产党宣言》，反复强调的是两个观点：一个是“两个彻底决裂”的观点。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另一个是“两个必然”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中共宣传机器把它概括为“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粗浅论断。

“两个彻底决裂”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一个理论支柱。基本意思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仅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只有抓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sup>43</sup>文革中，在“两个彻底决裂”的名义下，一切荒诞不经的事情，都可以用最神圣的革命理由推而广之。

文革的那些违背人们生活常情常理的口号和“新生事物”，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工农兵学员“上、管、改”，革“小生产”的命，把农民搞点副业说成是资本主义道路等等，都是打着“两个决裂”的名义。

从 1966 年 5 月到 1976 年 9 月，《人民日报》共发表有“两个

---

斯：《反杜林论（选读）》，5、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6、列宁：《国家与革命（选读）》。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是：1、《实践论》，2、《矛盾论》，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4、《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5、《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43 解放军某部理论小组：《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一点体会》，《人民日报》1975 年 2 月 28 日。

彻底决裂”文字的文章 211 篇。其中，中共“九大”前有 25 篇，“九大”后有 193 篇。“两个彻底决裂”的文章在 1971 年后的发表数量迅速增长。最为集中的是 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到 1976 年 9 月“粉碎四人帮”前夕，有 122 篇。《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两个必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文章，从 1971 年 6 月到 1976 年 9 月，共 20 篇。这是要以《共产党宣言》为文革的正当性背书，以表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继续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道统。实际上这恰恰是证明了文革在人民心目中的失败。人心的丧失，覆水难收，“继续革命”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

文革领导集团试图以《共产党宣言》的“两个彻底决裂”的观念和“两个必然”的信念，来统一人们的思想，维护文革的合法性。但人们生活的逻辑，要比政治教化的力量要更为强大得多。文革后期，人们已经不能接受文革这套空洞虚假的革命宣传了，怀疑和抵触的情绪弥漫于全社会。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他苦心经营十年的文革，也就随之榘崩栋折了。

文革结束后，中国转向改革开放，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破除了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观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共把这条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的“相结合”的新创举，具体体现为党的领导与市场经济的“相结合”，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抓手，发展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马克思主义道统标志的《共产党宣言》，仍然是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范本，不断开展学习运动，但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突破了马克思当年对未来社会的具体政策设计。《共产党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的革命目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产权保护，由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理论上对《共产党宣言》的“两个彻底决裂”和“两个必然”，做出了新的学理解读，补充上了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革开放中的新发展。

“两个决不会”的观点，是马克思于 1859 年 1 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无论哪一个社会

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决不会”讲的是文明发生的历史条件，这是不能人为超越的时代性制约。毛泽东时代发生的所有革命，都是因为跨越了时代而不能成功，每一场激进革命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而在这些最激进的革命旗帜上，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言，恰恰印上的是旧时代的徽章。用野蛮时代的原始兵器，建构不起来文明时代的现代大厦。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一再证明的事情。

“两个决不会”把《共产党宣言》的“两个彻底决裂”和“两个必然”，拉回到现实的土地上。这是只有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能得到的新认识。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对“两个绝不会”观点的中国化版本。《共产党宣言》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铭言，已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理解和认识，成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也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以人为本”的民主法治方向的时代规定性。

#### 四、结论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中国共产革命实践中的“相结合”能力，比同时代人更加高明，从而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论述了毛泽东在革命、建设、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归纳出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从经典文献的形成与演变的传播史角度，可能是一个考察和理解毛泽东与马列主义“相结合”理路的简达之道。在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文本选项中，《共产党宣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理想文本。从《共产党宣言》的传播过程，我们可以试图理解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的独特路径。

## 参考文献

1.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
2. 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三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演》，1958年7月1日。
3. 陈独秀遗著：《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自由中国社出版部，民国二十八年。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5. 《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伟大的历史文件》，1967年5月18日。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7. 解放军某部理论小组：《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一点体会》，《人民日报》1975年2月28日。
8.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9.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10. 李根清：《毛家湾林彪琐事》，《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1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12. 列宁：《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8-9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 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14. 刘少奇：《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15. 《刘少奇关于高级党校工作问题对杨献珍、侯维煜的两次谈话纪要》，1956年7月。
16. 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主编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17.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18.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
19.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

文集》第3卷。

20. 毛泽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21.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1月4日。
22.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集），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文革筹委会1967年5月编印，“编后”。
23.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二期），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小组1967年1月25日编印，“编后说明”。
24. 《毛泽东思想万岁》（上），河南二七公社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1967年8月编印，“前言”。
25. 《毛主席十年前所作的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的论文和演说》，《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0日。
26. 群众组织编印：《中央首长讲话》，1967年12月。
27. 《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1964年11月7日；《沿着伟大十月革命的道路奋勇前进》，1965年11月7日。
28.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1967年11月6日。
29. 【日】竹内实著：韩风琴、张会才译：《毛泽东传记三种》，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
30.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31. 宋镜明：《李达传论》，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32. 童大林：《社会主义的农业产业军》。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组编：《学习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文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59年。
33.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34. 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转引自《缅怀毛泽东》（上），第二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3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37.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编：《论共产主义公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

38.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文件附件，1964年2月15日。
39.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12日。